

■ 南开史学家论丛 ■

李喜所◎著

中國留學史論稿

沈青題



中华书局

南 开 史 学 家 论 丛

李喜所◎著

中國留學史論稿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留学史论稿/李喜所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
(南开史学家论丛. 第3辑)
ISBN 978 - 7 - 101 - 05472 - 9

I. 中… II. 李… III. 留学生教育 - 教育史 - 中
国 - 文集 IV. G649.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8418 号

-
- 书 名** 中国留学史论稿
著 者 李喜所
丛 书 名 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三辑)
责任编辑 梁 彦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3 字数 331 千字
-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472 - 9/K · 2462
定 价 29.00 元
-

总 序

南开历史系创建于1923年,但前三十年历史系在南开是蕞尔小科,有时只有一两人维系,不绝若缕。进入50年代开始了迅速发展,到今天已发展为南开的“四大支柱”学科(化学、数学、经济、历史,这是校方的提法),也是全国的史学重镇。这一变化的标志要从1987年全国评定重点学科说起。那年首次评定重点学科,南开全校共获得12个,而不足百人的历史系竟有三个。当时着实引起了轰动,名声大噪,人们刮目相待。一些人评论:历史系向来不显山不显水,原来水有潜龙,山有卧虎!近几年由教育部主持的全国一级学科评比中,南开历史学科居全国第二位,与北大相邻。重点学科重评后依然保持三个,其中中国古代史竟跃居首位。这一势态无疑为同行瞩目。出现这样局面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有大局和小局因素等等。大局是共同的,这里省略,只说小局,而且主要说1987年以前的情况。

说起来,我们既无“天时”之利,也无“地利”之便,剩下的只有“人和”一项。孟子说的“人和”就是称意的“人治”。就南开历史系以往的发展史而言,也只能从“人治”的角度去分析。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自身的有效发展。从制度上难于找到成因,而历史系又是著名的穷系,别的不说,一个教研室都分不到一间办公室,有一个时期系主任都没有一间办公室。因此“人治”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多次说过,历史系有今日之显赫,我们不要忘记学术带头人,尤其不要忘记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魏宏运几位多年的老领导。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这几位先生也多次跌宕起伏,但他们四位一直居于系领导中心。郑天挺、吴廷璆是党外的

民主人士(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共),杨生茂、魏宏运先生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杨生茂、郑天挺、吴廷璆交替任系主任或副主任,魏宏运则是“党代表”,到文革后期和80年代前期则继任系主任。他们之间的组合可以说是一种奇遇,配合的也很默契,像个“不倒翁”,在外力的冲击下不免左右摇摆,但他们有一个重心是不变的,这就是他们实行的“中左路线”。所谓“中左路线”,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政治上“跟而不紧”,不搞新花样,近似庄子的“应帝王”;二是有机会就抓业务。郑天挺先生、雷海宗先生、吴廷璆先生是大专家,不用多说,他们在业务上起着样板和指导作用。但他们的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这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安排。因此杨生茂和魏宏运无疑就成为关键人物。杨生茂先生已年届人瑞,而他从来就是一团瑞气:忠厚、虔诚、精深、宽容、执着集于一身。他至今依然是一位执着的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不要求一统;凡事以身作则,但不要求“达人”;学术上孜孜以求,执牛耳于一方,但决不傲人,对同事和后进一贯尊重有加。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杨生茂曾是我的领导(在一起编写教材),他从来不会说让我们如何办,但我们都听从他的,他是靠身体力行来领导的!时至今日,学术界已相当多元化,但对杨生茂先生的人品与学品几乎无不翘首起敬。魏先生作为“党代表”更是处在风头浪尖。在那个“左”的时期,他也不能全离开“左”,但只要有一点机会和空间他一定是“偏右”的,并依靠专家推进教学与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这几位先生狠抓教材建设,这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学术事业,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诸先生的几本中国古代断代史相继出版,雷海宗先生的《世界中古史》也交出版社,后因被划为“右派”而终止。其他先生也都有相应的讲义印发给同学。师辈们的努力为南开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风云突变,一场急风暴雨也席卷南开,雷海宗被康生点名定为大右派。说起来有点蹊跷,这位大“右派”摘帽很早。随后又给他配备了助手,进行专业“抢救”,1961年又被请上了讲台。魏宏运先生在这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杨志玖先生因为雷先生辩护遭到大报署名文章的

批判，如果在其他单位难逃“右派”的厄运，但由于魏先生再三说服有关人员，使杨先生免遭一劫。杨志玖先生多次同我说起，没有魏先生的庇护，后果不堪设想，别的不说，一家七口（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夫人为家庭主妇）不知如何生活下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王玉哲先生一向不问政治，不知从那来了一股激情，在讲授中国上古史时竟兴致勃勃地宣扬铁托在普拉的演说，这不能不招来批判。由于杨志玖先生得到庇护，王先生也就较平稳地过了关。如果真的把杨志玖先生、王玉哲先生划为“右派”，我敢说，南开中国古代史后来就不可能被评为重点学科。另外还有几位颇有才学的先生，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原单位都视为“包袱”，魏先生和杨生茂先生竟请来在历史系安家落户。那个时期不少系揪出过这种“集团”，那种“俱乐部”，相比之下，历史系却风平浪低。魏宏运先生、杨生茂先生总是谆谆告诫年轻人：有时间多读书！魏先生常以郑先生为例说，郑先生白天忙于公务不能读书（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夜间、假日要补回来，要向郑先生学习。新一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吹响，魏先生还热情地要青年向沈元学习（沈元，一位学历史的少年“右派”，在家励志苦读，写出了出色的学术文章）。这个班子还商定，要每个青年教师订出进修计划，并指定导师负责，定期检查和汇报，有点像现在的在职研究生。凡此种种，每次政治运动一来，“革命者”都要批魏先生的“右”。1959年差一点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处于半倒状态，被“挂起来”。“文革”乍起即把魏先生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这无疑是很合乎当时的政治逻辑的。但在历史系一群中，魏先生的革命资历比较长，又没有“历史问题”，出身“贫农”，他的言行多半属于重业务、依靠专家之类，也说不上什么大的政治问题，即使一时被打倒，到落实政策时又能勉强站起来。“文革”中期结合干部时，还只能是他，并且继任系主任。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他“痼疾”依旧，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大家编写教材，把多数人又引入“业务”之中，成就了“文革”后的一批教授。

在这篇序中我讲这些干什么？我是要说明，没有郑天挺、吴廷璆、

杨生茂、魏宏运几位组合成的“中左路线”，就没有“人和”，就没有相对平静的读书环境，就没有学术气氛，就难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梯队，我也敢断言，也不会有三个重点学科的降临。有人说，还是“左”了一点，或许是这样。但有一个事实：魏先生几次是因“右”而倒台。再“右”一点会如何，谁来“右”？有道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对评定重点学科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论，但我认为这总是一个重要的整体性学术水平标志，南开历史学科一下子能有三个重点学科真是不容易呀！有了重点学科为南开历史学科进一步发展带来机遇。因为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向重点学科倾斜，其后这个“项目”、那个“工程”以及什么“基地”、“中心”等等，都与有否重点学科有密切的关联。自从有了重点学科，南开历史学科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科研与教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我在这里说重点学科也有另一层意思，它与“南开史学家论丛”人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第一辑收入的作者都是我们的师辈，多数又是首次申请重点学科的带头人。这里要说明一点，吴廷璆先生无疑是“第一辑”中的首选。但当具体编辑时，得知吴先生的文集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果再选入本论丛，就会发生版权冲突，无奈，只能暂付阙如，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收入。

编辑第二辑时，人选难于确定，进退维谷。多种因素制约又不能敞开编选，于是找了一个省事的办法，在难于处理的地方，以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为限。

第三辑入选者对象是新一代学者。这一代人都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应该说也都得益于重点学科提供的条件。这一代人才济济，我没有能力一一准确评价和排座位，于是采取了更简化的办法，凡在新一轮重点学科申请中任学术带头人的都收入。这就是本编的六位同志。这个办法易于操作，但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遗憾。只能留到以后再弥补。这次编辑的原则与前两辑也有所不同，这次要求每个人拿出专题

性代表作,只要看本辑的书名就可一目了然。每个人的专长与简况在卷首作者简介中已有交代,这里不再重复。

在这十位作者中,王永祥教授不幸英年早逝,令人不胜唏嘘,在此谨表沉痛的哀念!

还有几位同志从南开“分身”到其他大学任教(他们还在南开兼职),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喜者,南开历史学科培养和成长出了出色的学者,成为“争抢”的对象,是南开的骄傲;惧者,南开流失了人才!天耶?地耶?人耶?令人叹息!南开历史学院是有情的,人虽走,茶不凉,对他们的离开,我们不免怅然,但他们为南开作出的贡献我们将永志不忘,本论丛以收入他们的著作为荣。南开永远是他们的家!

最后我要说几句我的学长范曾先生。孔子说“依於仁,游於艺”,用于范曾最为恰当。范曾靠一支妙笔画尽风流、尽述情怀,天下谁人不知?!这里我仅说几句他对母校的返哺:他创建了东方艺术系,开拓了艺术史的研究,教书育人呕心沥血;这些年来来的捐赠逾千万,其中仅历史系就有数百万之巨,其中有对恩师的孝敬,有对后学的奖掖,捐建了“范伯子学术基金”,长期支持对学术研究。“仁者,爱人”,范曾,仁哉、仁哉!

是为序。

刘泽华

2006年11月

于南开大学洗耳斋

自序

我潜心研究中国留学史是一定的兴趣和特定的时势交织运作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20多岁的我十分荣幸地加入了华北几所大学的老师集中在北京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队伍,具体负责辛亥革命一章。留日学生运动自然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但可参阅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在和前辈老师们聊天时,大家都觉得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巨大,以往的研究却很少涉及,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随之我对留学生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致,开始搜集资料。待我们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付梓的时候,已经进入80年代,形势大变。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航程的快速推进,留学大潮风云突起,特别是自费留学的开放,考托福、GRE那长长的队伍,不能不引发史学工作者对中国留学生历史的探讨。客观现实迫使我加快了研究的步伐。我一向认为,史学研究的动力深藏于动荡起伏的现实之中,虽然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立竿见影式的直观反映,但无形之中的潜移默化足以左右研究者的走向和价值判断。从80年代开始,我的留学生研究开始大踏步前进。先是就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的留学生进行专题研究,写出几篇有分量的论文,后又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在1987年出版了18万字的小书《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以此为基础,我又用五年时间写出了30多万字的专著《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作为名家学术文库2006年重印)。作为该书的副产品,《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一书也于199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后,我还陆续完成了三项留学生方面的国家课题。目前,正全力完成200余万字的《中国留学通史》。我的博士研究生中,已经有十多位做留学史的专题

研究。他们的博士论文创新意识浓厚,学术开拓显著。为推进中国留学史的研究,我们和徐州师范大学于2004年在天津和徐州联合召开了“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2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出版了80多万字装帧精美的会议论文集。每当回忆起这些看似平常的工作往事,心头油然泛起一丝快意,亦有那么一点点成就感。如今,我近三十年来发表的关于留学生的论文,又选编在一起,由声望卓著的中华书局出版,自然高兴。这首先要特别感谢范曾教授的无私援助和全力支持。

在多年的留学生研究中,在从宏观上把握留学生时,我思考较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其现代文化的文化特征;二是其社会角色的客观定位。

众所周知,中国留学生无论在晚清、民国,还是在新中国,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都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其直接原因是他们在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中做出了贡献,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在于他们掌握了现代的知识和本领,这又一次应验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知识不仅决定着个人或群体的成败,也深层次地影响了民族和国家的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制约下,中国人面临着知识的全面更新。几千年来固有的知识资源和知识系统已经难以完成具有本质意义的知识转换,所以在引进西学的同时,艰难地改进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方法,以便开凿新的知识源流和建造新的知识系统。其牵动全局的举措就是教育改革。在废除科举制度的进程中创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堂,逐步确立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年轻一代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分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为了原原本本的去汲取欧美和日本的现代知识,亲身感受那里的社会文化,尤其为了培养高级人才,也同时启动了花费巨大的留学教育,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步伐越来越大。留学生因之慢慢变成新型知识群体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特殊阶层,举足轻重。之所以如此,和留学生亦中亦西、亦“土”亦“洋”,或曰学贯中西的文化构成有密切

的关系。除早期的留美幼童之外,多数留学生出国时已20岁左右,受过较系统的中国教育,掌握了基本的中国文化知识,大致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母体文化在其一生的任何时候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长期辐射效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留学生的这种文化身份决定了他们在选择西方文化时已经有了一个前提意义的中国文化,所以他们只能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去融合中西,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抛弃母体文化而另起炉灶。即使是非常“西化”的中国留学生,像容闳那样一度都讲不好中文,像胡适、陈序经那样主张全面学习西方,他们身上的中国元素仍然处处可见,他们的基本思维和行为方式也抹不掉中国特色。留学生的“洋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洋化,中国文化的根是不可能彻底“化”掉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留学生毕竟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即使是到日本留学,也主要是学习日本化了的西学,西学或者说西方文化对中国留学生方方面面的熏陶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具体到每个留学生所接纳的西方文化程度不同,但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寻到西方文化的因子。即使像对西方文化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吴宓,他在哈佛大学留学时也不自觉地受到了美国文化的熏陶,其在主持清华国学院时所表现出来的管理理念和文化追求,西方文化的成分并不算少;被学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当中的那些留学生,像冯友兰、汤用彤这些人,在留学时学到的西方的现代知识和研究方法,长久的作用在他们的学术研究当中。中国留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虽然基本是中国式的西学,但毕竟还是凝结着西学的元素。留学生是西学和中学交融、运会的新的文化产儿。他们的知识结构从总的倾向上讲,是中西相间、土洋结合。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这样的新型知识最有展示的空间。原因很简单,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绝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沿着固有的传统走下去,必须融入世界,追赶世界潮流;但也不可能原原本本的照搬欧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时时刻刻会起作用,中国特色是永远不可能抹掉的。新的中国文化只能是土洋皆备的现代中的传统,传统中的现代。那些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又有广博的西学素养的新人才必然是社会

的宠儿。留学生的中西兼通当然就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成了推进社会文化更新的佼佼者。

一般来讲,人的社会角色的确立,主要是通过知识与社会的互动来完成,也就是人的智慧的社会化水平和社会的接纳程度,从总体上决定了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阶层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留学生融合中西的知识特征和近现代中国社会对通中西、博古今复合型的现代人才的渴求,别无选择地将多数留学生推向了社会文化变革的前沿地位。有的学者称留学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领跑者,在政治变革、经济转型、思想启蒙、文化更新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有的学者则将留学生定位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力量之一,在百余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几个重要时刻,留学生都起了先锋作用;有的又将留学生看作近现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代表者,留学生文化不可否认的处于中国多元文化交汇的优越地位。对留学生的这些宏观上的角色定位,确实都有道理,我的一些文章也程度不同地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但如何从留学生的知识和文化特征以及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比较准确地界定中国留学生,则还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我近来的粗浅看法是,留学生是中西文化对接的一个特殊的知识载体,这既反映了留学生的知识特点,又触及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新陈代谢的重心,比较切合历史实际。近现代中国演进的历史表明,古今中西问题几乎是牵动一切问题的轴心,而古今问题又是由中西问题而引发的,所以中西问题的解决具有决定意义。只要中西文化关系得到合理的解决,或者说逐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对接,所谓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现代以及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型也将随之迎刃而解。留学生这个由中西文化培植出来的新的知识群体就自然成了对接中西文化的天然载体。这就将中西文化乃至中外文化的对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铸造知识人才的层次。

异质文化的交流或对接,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只停留在狭义上的文化对文化的交融,基本不触及社会经济的变革,当然也不会

产生与这种社会经济变革相衔接的知识群体。源远流长的佛教的汇入中国文化和明清之际二百余年中西文化的交流,大体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的交流由于没有经济社会的变动作支撑,只能局限于精神文化范围,而不会引发影响社会全局的带有本质上的社会转向。特别是像东西文化这样差异甚大的文化交流,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变革作基础,实质意义上的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流,由于有了像洋务运动那样的社会经济的变革,就迅速突破了明清之际二百余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格局,西方文化大踏步的嫁接于中国的各个领域。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仅仅一个多世纪就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中西文化对接。这可看作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个层次,即以经济社会变动为基础的文化交流。而经济社会的变动必然要催生反映其走向的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和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必然要产生善于融合中西的知识阶层。中国留学生从洋务运动时期崛起,逐步兴盛并成长为新型知识群体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阶层,恰是这种历史演进中合乎逻辑的发展。这就将中外文化交流提升到了由知识群体充当核心媒体的更加深入的第三个层次。中国留学生充当融合中外文化的知识载体的社会角色也随之确立。

本书收录的33篇文章是从我发表的40多篇有关留学生的论文中选出的,内容主要涉及总体的考察,具体国别的研究如留美、留日、留法等;还有对不同时期,如洋务时期、辛亥革命、五四时期留学状况的评述等;一些比较重要的典型人物,像容闳、孙中山、宋教仁、辜鸿铭、胡适、宋庆龄等,也有专文论及。由于这些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同,学术认知也在不断深化,极个别的观点前后略有差异,为保持原貌,尊重历史,基本没有改动,只是在文后注明了发表的时间。同样,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又研究的是同一个专题,某些小地方在使用资料和事例方面的重复在所难免,这也是专题论文集较难克服的一个缺憾。

总之,本书的出版是我研究留学史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今后必将以

此为基础,继续努力,争取有新的开拓。说实话,本书抛下的仅是一块砖,如果对学界今后的研究起一点铺路的作用,我就如愿了。

李喜所

2006年春节于南开大学书来堂

目 录

自 序	(1)
中国留学潮的回顾与展望	(1)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良性互动	(13)
20 世纪中国留学生的宏观考察	(23)
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轨迹	(31)
学术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留学生研究	(44)
深化中国留学生研究的三点思考	(48)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群的构建	(53)
中国留学生与现代新儒家	(71)
中国留学生与传统文化	(89)
清末的留学管理	(97)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留学生	(111)
容闳与中美文化的沟通	(124)
容闳与留美幼童的派遣	(136)
容闳的晚年	(152)
留美幼童小传	(169)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欧学生	(186)
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	(196)
辜鸿铭与中西文化	(199)
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	(207)
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	(248)
清末留日学生与拒俄运动	(254)

清末留日学生的译书	(264)
清末民国时期留日学生的日本观	(278)
宋教仁留日时期的思想特点	(292)
近代留美学生的文化定位	(302)
清末民初的留美学生	(316)
南开留美学生述论	(328)
由留美学生看人才培养	(346)
中国科学社简介	(351)
留美时期的宋氏三姐妹	(355)
留美时期的胡适及其文化倾向	(361)
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与中法文化交流	(383)
中国留学生与五四运动	(404)

中国留学潮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留学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其间在本世纪初、五四前后和 80 年代出现几次颇有影响的留学潮。每次留学潮发生的背景、运作的特征,对中国社会的回振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在中国社会发生转折的重大关头,一场场五光十色又驳杂难辨的迷人“钱塘江潮”,潮起潮落,都促进了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拥抱中国的历史进程。

一 简要的回顾

20 世纪初的留学潮以留日为中心,留美、留英、留法、留德等虽然也有一定的进展,但远不能和留日相提并论。1906 年前后的十年间,留日学生约 2 万多人,上至七八十的老翁,下至十来岁的幼童,纷纷负笈东洋,留学求知。辽宁有位十几岁的男孩,在留日的冲击下,背着干粮赴日留学,结果流落在外七八天,又被迫回乡。那时从天津、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总是载满赴日留学的青年。史书称当时的留日生“相望于道”。之所以出现如此动人的留日热潮,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也迫使中国人要摆脱中世纪的羁绊,走向世界民族之林。容闳 1847 年的赴美留学虽不能讲是鸦片战争冲击的结果,但透露了中国人要向西方学习的信息,反映了中华民族要与欧美并驾齐驱的雄心壮志。20 年后发生了洋务运动,李鸿章等一帮洋务官僚试图将“求强”、“求富”变为现实。随着西方先进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引进,为迅速培养洋务人才,容闳与曾国